【区域经济理论】

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李鹏飞 叶云岭

摘 要：流域作为兼具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合空间单元，是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资源约束、空间组织、要素配置和制度协同共同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理论逻辑：资源约束限定开发强度和功能边界，空间组织塑造“节点—通道”空间格局，要素配置提升跨区域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制度协同强化跨区域规则衔接和利益协调。然而拓展流域经济模式仍面临流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边界之间矛盾突出、流域功能梯度导向的产业分工体系尚未健全、上游保护与下游受益尚未形成稳定利益调节机制、流域整体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偏离、流域整体治理尚未形成闭环等制约。为此，应以资源承载边界为前提，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底图，优化流域空间结构和整体布局；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促进互联互通与要素畅通流动；以制度协同为抓手，强化规则衔接和利益协调；贯通规划、政策与评估，健全流域治理长效机制。

关键词：流域经济模式；区域联动发展；空间组织；要素配置；制度协同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005-10 **收稿日期：**2026-05-24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研究”(2026YZD007)。

作者简介：李鹏飞，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6)。

叶云岭，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一、引言

在新发展阶段，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是深化跨行政区合作、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陆续出台，为流域经济发展和跨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政策支撑，凸显了流域在经济发展、生态安全与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作为典型的大河流域经济体，拥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和辽河等七大流域。这些流域水系具有支撑经济联系和要素流动的天然条件，是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七大流域覆盖全国47.3%的国土面积、承载82.7%的人口并贡献约82.6%的国内生产总值(宋建军，2023)。流域长期承载人口、产业、城镇和基础设施集聚，是国家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带状空间。流域是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相互嵌套的复合地域系统：自然属性表现为水系连通、生态联系紧密和资源环境承载边界相对完整；经济属性表现为产业联系、要素流动和基础设施网络沿流域展开；社会属性表现为跨越多个行政单元，涉及公共治理、利益协调和流域事务管理等多重关系。流域内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之间在资源环境、产业布局、基

础设施、城镇体系和公共治理等方面存在相互依赖关系，流域经济系统是具有外部开放边界和内部复杂相互作用的经济地域系统（陈才等，1999）。因此，区域联动发展难以在单一行政区尺度内得到有效回应，需要在流域尺度上统筹资源约束、空间组织、要素配置和制度协同。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流域经济内涵的演进

流域经济属于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是国民经济活动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敏等，2023），其内涵经历了从地理空间属性向综合发展范式的演进。张思平（1987）较早提出流域经济学问题，早期研究多将流域视为经济活动的地理载体，侧重水资源利用与开发。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认识到流域是自然、经济、社会相互嵌套的复合系统。刘世庆等（2018）进一步指出，流域经济并非政区经济的简单叠加，而是基于水系联系形成的跨行政区域经济关联。

近年来，流域经济的理论内涵进一步拓展。宋敏等（2023）认为，流域经济是以流域空间为载体、以水资源为核心，通过要素流动与产业关联形成的特殊经济类型。易淼等（2025）从分工与发展的视角指出，流域经济发展本质上是社会分工在流域空间上的深化与拓展。从政策层面看，流域经济模式是以自然流域为空间组织尺度、以流域共同资源禀赋为基础，推动沿线地区围绕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形成跨行政区联动的发展方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2025）。

典型流域研究也表明，长江经济带、淮河流域和汾河流域等虽在经济联系、空间分异和治理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均体现出流域内部经济活动的关联性、差异性与整体性（吴传清等，2020；孔丹丹等，2021；史利江等，2020）。流域经济的内涵逐步由沿河资源开发和产业布局，拓展为兼具资源约束、空间组织、产业联系和制度协同属性的综合性区域发展范式。

（二）流域经济模式与区域联动发展相关研究进展

关于流域经济模式的研究大体可归纳为三支。第一支关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表明生态约束已成为理解流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前提（Chen等，2018；赵敏等，2022；孙久文等，2022；任保平等，2023；姚石等，2023；张改清等，2023）。第二支关注流域产业布局与空间结构，主要从经济格局、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差异、空间集聚和产业转移等方面展开，说明流域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节点功能和交通通道条件密切相关（曾浩等，2015；冯兴华等，2016；张予川等，2017；王林梅等，2015；张跃等，2021；田野等，2020；王良虎等，2020；彭继增等，2017；胡森林等，2020）。第三支关注流域治理与制度协调，强调应理顺政区与流域边界、政府与市场、开发与保护等关系，并从绿色发展、国际比较和理论体系等角度讨论流域经济的治理机制与推进方向（刘世庆等，2018；贾若祥等，2019；宋敏等，2023；易淼等，2024；易淼等，2025）。

区域联动发展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跨区域联系、联动效应及其转化机制、协同治理等。相关研究表明，区域联动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格局演变并促进要素流动与循环（邓创等，2023），也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张虹鸥等，2018）。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已拓展到比较优势发挥、分工协作、要素自由流动与生态共治等方面（陈耀，2018），区域联动发展日益依赖跨尺度空间组织与制度协调（毛熙彦等，2021；郝宪印等，2024；叶振宇，2024）。

从两类文献的交汇点看，已有研究为理解流域经济与区域联动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二者之间仍存在衔接不足：流域经济研究多聚焦于流域内部的资源、空间与治理问题，区域联动发展研究则多围绕城市群、都市圈和行政区合作展开，对流域这一兼具自然整体性、空间连续性与跨行政性的复合单元关注不足；同时，现有研究虽分别涉及资源环境约束、空间组织、要素流动和制度协调等内容，但尚未形成解释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统一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将流域经济模式界定为以自然流域为空间载体，依托流域共同资源，在资源环境承载边界约束下，通过空间组织、要素配置与制度协同，统筹生态环境共治、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共建与区域联动的组织化区域发展方式。

围绕上述不足，本文重点回应三个问题：区域联动发展为何需要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流域经济模式通过何种机理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拓展流域

经济模式又面临哪些现实约束及其实践进路？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将流域经济模式置于区域联动发展视野中,围绕资源约束、空间组织、要素配置与制度协同四个维度解释其作用机制,并将理论逻辑、现实约束与实践进路贯通起来,为流域尺度下区域联动发展的政策设计与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三、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理论逻辑

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是资源约束、空间组织、要素配置和制度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四者构成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内在机理(见图1)。

(一)资源约束逻辑:限定开发强度和功能边界

资源约束逻辑首先体现为共同承载边界对开发秩序的限定。流域经济模式需要在流域尺度上识别水资源供给能力、水环境容量和生态系统承受阈值,并据此协调不同区段的开发强度和功能边界,将资源环境约束转化为区域联动的前置条件。

流域资源环境承载边界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促进区域联动。其一,限定不同区段的发展强度。水资源供给能力、水环境容量和生态系统的承受阈值决定了不同地区能够承载的发展类型和规模。若各地区脱离流域承载能力,仅从本地增长目标出发争夺水资源、布局高耗水高排放项目、提高开发强度,就会导致资源超载、环境压力累积和生态风险上升,削弱流域协同性。其二,划定不同区段的功能边界。流域内不同区段在水源涵养、生态屏障、农业生产、工业承载、港航运输和城镇集聚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约束条件。将资源环境差异转化为开发和保护的边界依据,有助于避免功能错配和无序开发。可见,资源环境承载边界既构成开发约束,也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基本依据,有助于强化流域治理秩序(刘曙光等,2020)。与主要依托市场联系、产业协作或政策协调的一般区域发展模式不同,流域经济模式首先受共同水系和资源环境边界约束,资源环境约束构成拓展流域经济模式的逻辑起点。

(二)空间组织逻辑:塑造“节点—通道”空间格局

空间组织逻辑体现为流域自然连续性向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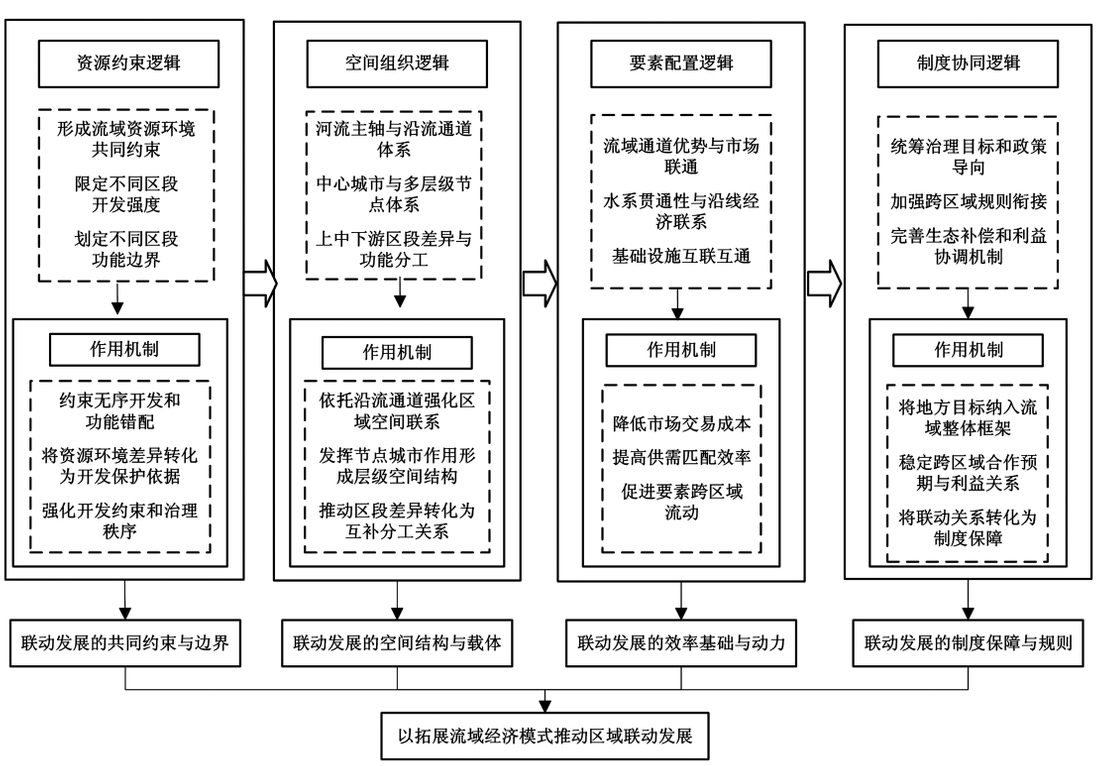


图1　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理论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联系的转化。河流主轴、沿线交通通道、节点城市和产业布局在长期演进中相互嵌合，形成具有轴带特征的空间结构。这一结构与“点—轴系统”理论强调的节点集聚、轴线联结和带状扩展相契合（陆大道，2002；韩增林等，2005）。在流域经济模式中，节点城市和沿流通道共同构成区域联动的空间骨架，区段分异则为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互补分工提供基础。

流域空间组织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影响区域联动。第一，沿流通道强化区域空间联系。河流干流及重要支流通常与交通干线、产业廊道和城镇带相互耦合，这使沿线地区在同一轴带上形成联系，推动区域空间联系由局部邻近转向沿流域轴线展开。第二，节点城市形成层级化空间结构。流域联动不是各区段之间的均质联系，而是依托不同层级城市节点展开。中心城市承担综合服务和组织协调职能，区域性节点城市承担区段衔接和区域服务职能，一般城镇嵌入相邻区段的生产生活空间。通过层级化节点体系，流域内部的地理联系得以转化为有组织的空间联系。第三，区段分异构成流域空间格局的差异化基础。流域上中下游在资源禀赋、地形条件、生态功能、产业基础和市场区位等方面存在差异，关键在于通过合理空间组织将其转化为互补关系（覃成林，2011）。对于长江、黄河等流域而言，上游地区多承担生态涵养、水源保护和初级资源供给功能，中游地区多承担能源转化、制造支撑和通道组织功能，下游地区依托平原腹地、港口条件和市场优势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开放型经济。沿流通道、节点城市和区段分异分别从联系方向、层级结构和差异基础三个方面，共同塑造区域联动的空间格局。

（三）要素配置逻辑：提升跨区域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要素配置逻辑体现为通道优势和市场联通对配置效率的提升。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基础因素在于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能否突破行政区分割，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和合理配置。流域水系的贯通性和沿线经济联系，有利于形成跨区段要素流动体系和市场联系体系。

要素配置逻辑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市场一体化降低交易成本。市场准入、标准要求、公共服务和监管要求逐步一致后，要素价格和供需信号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调节作用。其二，要素市场发育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供给与需求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匹配，提升配置效率并优化要素结构。其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交通、物流、信息等基础设施条件改善，有助于提高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流动效率。

市场联通、要素市场发育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作用，推动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匹配和配置，提升区域联动效率。市场一体化能够通过基础设施改善、要素流动加快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促进区域发展（生延超等，2024）。流域开放通道越完善，越有利于带动流域内部和流域内外经济联系深化（刘曙光等，2020）。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市场联通和要素流动程度越高，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衔接越紧密，区域联动效率基础越稳固。

（四）制度协同逻辑：强化跨区域规则衔接和利益协调

制度协同逻辑体现为跨行政区共同目标向一致行动的转化。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联通等事项超出单一行政区治理边界，需要通过规则衔接、政策协调和利益调节加以统筹。将流域共同目标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安排，区域联动发展就会更具有持续性。

制度协同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其一，统筹治理目标。围绕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和基础设施联通等事项形成一致的政策导向，减少目标设定和执行标准差异。其二，推进规则衔接。围绕规划要求、环境标准、项目审批、监管执法和责任落实等环节加强衔接，降低跨区域协作成本。其三，完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生态补偿、责任分担和收益共享，把保护责任、治理成本和受益关系纳入同一制度框架，增强合作的持续性。

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的关系，集中体现为流域边界与行政区边界、开发与保护等关系的协调问题（刘世庆等，2018）。从实践看，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长江流域协同治理、永定河流域平台化运作，均体现了跨区域规则衔接和利益协调的制度探索（李忠等，2025）。田纳西河流域和莱茵河流域治理能力的形成，也有赖于统一管理机构、跨区域规则体系和持续协调机制的支撑（刘曙光等，2020）。因此，制度协同的逻辑在于以共同治理目

标约束属地行为,以规则衔接降低协作成本,以利益协调稳定责任分担和收益关系,从而为区域联动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主要现实约束

尽管流域经济模式具有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和逻辑,但仍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产业分工不充分、利益调节不健全、目标协同不足和治理闭环不畅等制约。这些制约相互交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制约产业布局,引致流域功能梯度导向的产业分工体系尚未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削弱上下游协作基础,目标偏离导致政策取向分化;治理闭环不畅则使规划、政策、实施、评估和反馈难以及时衔接,削弱贯通与纠偏能力。五类约束共同构成区域联动发展的制约因素(见图2)。

(一)流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边界之间矛盾突出

部分流域在城镇扩张、产业集聚和岸线利用过程中,开发利用强度与水资源、水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等承载边界不相适应,资源消耗、污染排放和空间开发对承载边界造成较大压力。尤其是在生态脆弱、水资源约束较强的流域,水资源刚性约束、生态保护要求与产业发展需求交织叠加,开发强度与承载边界之间的矛盾表现更为集中。

具体而言,一方面,部分流域仍存在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资源利用强度偏高的问题。以黄河流域为例,水资源相对短缺、生态本底较为脆弱,部分地区开发利用强度较高,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仍然较为突出(易淼等,2024)。另一方面,一些流域在特定发展阶段对水环境容量、生态敏感性和岸线开发强度重视不足,高耗水、高排放、高环境负荷产业沿流空间集聚,进一步加大了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和岸线管控压力。以长江流域为例,中下游部分地区曾较为集中地出现“化工围江”问题,沿江化工布局偏密、岸线开发强度偏高,局部区段生态环境压力和流域治理压力同步加重(吴传清等,2020)。

(二)流域功能梯度导向的产业分工体系尚未健全

流域不同区段在资源禀赋、生态敏感性、交通区位、市场腹地和产业基础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应据此形成差异化功能定位和上下游产业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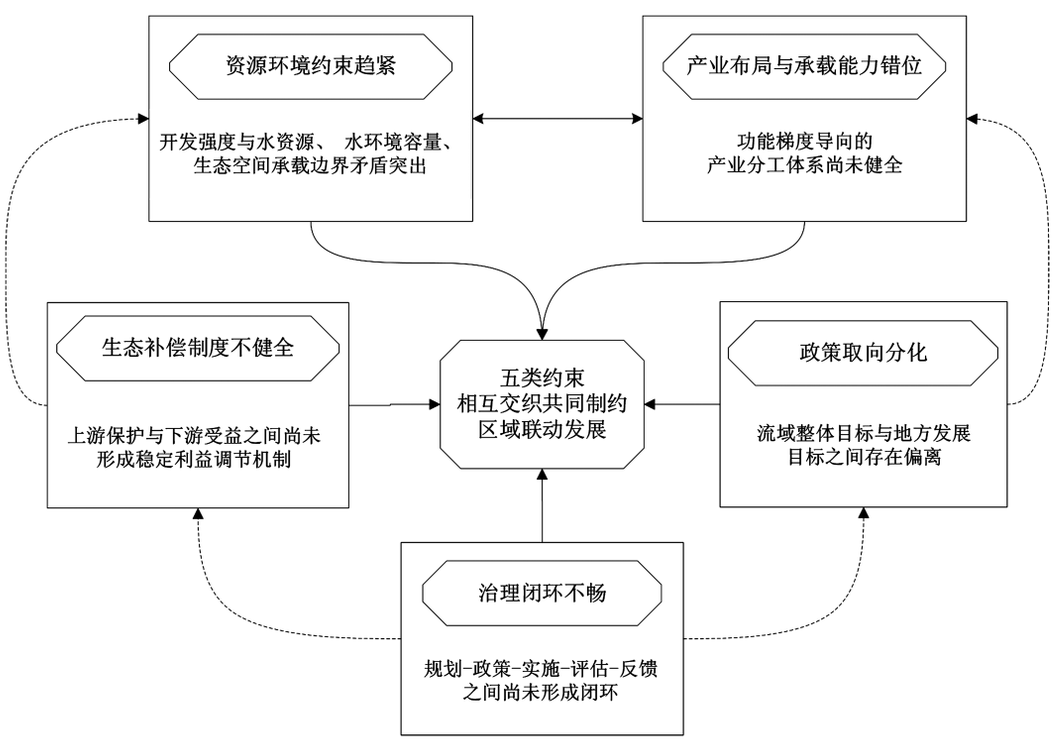


图2 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主要现实约束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工，但现实中，一些区段的产业选择与功能定位、比较优势之间仍存在偏差，同质化竞争、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依然存在，致使流域内部比较优势难以有效转化为分工优势，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区域联动发展的产业基础也因此受到制约。

具体来看，部分生态功能突出的区段仍集聚了较多高耗水、高排放产业，产业发展与区段功能不协调；具备承接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区段则因产业配套、平台支撑和跨区域协作不足，难以有效承接产业转移。流域内部既存在产业同构化竞争和重复建设，也存在上下游之间衔接不紧、区段之间协作不足的问题，产业体系能级与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长江、黄河等流域不同区段之间发展不平衡、产业层次偏低、重工业化特征较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足，上中下游之间尚未形成稳定高效的分工合作网络；即便经济空间分布已呈现一定梯度，这种梯度差异也未能充分转化为清晰稳定的产业分工关系（杨丹等，2020；高煜等，2020）。

产业布局与承载能力错位，源于承载能力评价、主体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优化衔接不足。部分流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边界尚未有效转化为产业准入和退出的明确约束，区段功能差异也未充分落实到产业链分工和生产力布局之中。同时，流域内部重大生产力布局统筹、产业链组织和跨区域要素配置能力仍然不足，比较优势难以持续转化为上下游产业协作和区段联动关系。

（三）上游保护与下游受益尚未形成稳定的利益调节机制

永定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表明，健全价值核算、经营转化和利益分配机制，有助于把生态保护责任转化为可持续的区域协同收益（李忠等，2025）。然而，七大流域上下游地区保护投入、发展约束和生态受益有待形成稳定的利益调节机制。上游地区承担水源涵养、生态修复和污染防治等任务，需要限制部分开发活动并持续投入治理成本；中下游地区则通过水质改善、水量保障和生态环境改善获得收益，但相应的成本共担和责任分担机制仍不健全。保护投入与收益获得在空间上存在错位，既不利于激发上游地区持续保护的积极性，也影响流域协同治理的稳定性。

当前，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尚未充分化解这一矛盾。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资金来源和补偿方式仍有待完善，部分补偿实践的长效机制仍有待健全。横向生态补偿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衔接不够紧密，生态贡献核算、责任分担和收益补偿之间尚未建立清晰关系。新安江、汀江—韩江、九龙江等流域虽已开展生态补偿探索，但相关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仍然有限。

（四）流域整体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偏离

流域发展要求不同区段在资源利用、产业布局、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形成相互配套的政策体系，但现实中这一要求尚未在各地区充分落实。涉水治理、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产业发展和交通建设等事项分属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政策目标、规制标准和实施节奏之间仍存在分割，跨部门、跨区域统筹不足。同时，地方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税源培育等现实压力下，对本地发展与流域整体发展的统筹协调不够充分，容易出现产业布局趋同、低标准竞争和决策短期化等现象。在上述因素作用下，流域层面的总体目标在进入地方规划和政策执行后，常被分解为行政区内部任务，统一要求难以及时转化为协同行动，区域联动效应也受到削弱。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协同发展，需处理好流域边界与行政区边界、开发与保护等关系（刘世庆等，2018）。

政策取向分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流域治理要求与行政区治理方式之间协调不足。政策制定、项目管理、财政约束和绩效评价仍主要依托行政边界和部门职责展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容易围绕各自目标分头推进，流域整体目标难以转化为持续一致的政策合力。政策取向分化实质上反映了局部利益与共同利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张力，也制约了流域经济模式对区域联动发展的支撑作用。

（五）流域整体治理尚未形成闭环

流域总体规划在专项政策、跨区域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中的细化落实不足，会影响规划目标落实、政策工具配套和实施责任分工，进而削弱区域联动推进效果。现阶段，部分流域总体规划在专项政策、实施标准和项目清单中的细化落实尚不充分；部分专项政策虽已出台，但与资金配置、项目管理、责任分工和平台支撑之间配套不足，跨区域重点任务的协同推进仍需加强。

部分流域监测评估更多关注单项任务完成情况，对流域治理效能、区段协同效果和长期治理成效缺乏持续跟踪评价；评估结果在后续政策优化、项目调整和资源配置中的运用也不够充分。流域经济系统具有开放性和跨行政区特征，其治理效能取决于规划、政策、实施和评估反馈之间能否形成有效衔接。因而，规划引导、政策落实、跨区域实施和评估反馈之间仍存在断点，影响流域治理闭环运行，从而制约了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成效。

五、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实践进路

拓展流域经济模式进而推动区域联动发展，应围绕资源承载边界、流域空间结构、要素跨区流动、跨行政区制度协同以及治理闭环构建等方面，将流域整体性转化为发展边界、功能分工、市场联通和协同治理的模式，形成与流域整体性相适应的实践进路。

（一）以资源承载边界为前提，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

拓展流域经济模式，应以资源环境承载边界为基本前提，将其作为产业准入、项目审批和空间管控的重要依据。流域经济不同于一般区域经济，水资源、水环境和生态承载力构成开发利用必须遵循的发展边界。应在流域尺度上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逐步降低产业发展对于水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依赖，并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转化为产业准入、项目审批和空间管控标准。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和黄河流域“四水四定”要求表明，应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约束落实到流域开发、产业准入和项目布局全过程。

将水资源承载力作为产业布局和项目准入的重要依据。对于资源环境约束较强的区段，应控制高耗水、高排放和高环境负荷项目布局，推动存量产业节水改造、清洁生产和集约利用；对于仍具备承载潜力但生态约束较强的区域，应通过节水提效、污染减排和空间优化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新增资源投入的依赖。同时，结合流域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推动流域产业链错位发展、有机衔接，引导不同区段围绕优势环节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承担水源涵养、生态屏障和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区段，宜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农业、生态旅游和康养服务等领域培育增长点；资源条件较好、工业基础较强的区段，应通过绿色技术改造、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和产业链延伸，降低单位产值的水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

（二）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底图，优化流域空间结构和整体布局

以流域经济模式更好发挥区域联动作用，需将流域内部既有的空间联系进一步转化为分工明确、协同有序的功能联系。应以主体功能区划为依据，统筹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发适宜性和区段功能定位，依托流域主轴和城市节点，推动流域内部由分散开发走向整体布局，由局部联系走向系统协同。

以干流和主要支流为依托，优化“点—轴—面”空间结构。以中心城市和区域性节点城市为主要节点，形成层级清晰、联系紧密的节点体系；以流域主轴及沿线综合通道为支撑，增强不同区段之间的空间联系；统筹开发区、园区等产业承载空间布局，推动不同区段形成分工清晰、功能互补的流域空间结构。

流域空间结构优化还要体现区段差异。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生态功能突出、开发约束较强的区段，应突出生态保护和生态产品供给功能；对于具备资源转化和制造基础的区段，应提高绿色化、集约化发展水平；对于区位条件较好、城镇和产业基础较强的区段，应增强综合服务和区域带动能力。

（三）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促进互联互通与要素畅通流动

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在于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能够跨区域顺畅流动，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拓展流域经济模式，应依托沿流通道和既有经济联系，加强市场规则衔接和基础设施联通，提升流域要素配置与市场整合能力。需将市场联通、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统筹起来，以更高水平的流域市场一体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着力推动流域内部市场规则和制度衔接，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标准规则、检验检测、监管执法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提高一致性，降低企业跨区域布

局和经营的制度性成本，促进商品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完善与流域经济模式相适配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结合流域沿线区位条件与发展需求，优化水运、陆路、航空等基础设施网络，统筹布局信息通信系统、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畅通跨区域、跨流域通道，增强流域内部市场整合能力。在此基础上，围绕重点产业链和关键环节深化上下游协作，加快跨区域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促进不同区段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内转化为分工协作优势。

（四）以制度协同为抓手，强化规则衔接和利益协调

流域整体性要转化为稳定的区域联动关系，需要把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基础设施联通等跨区域公共事务纳入统一协调框架，统筹不同区段之间的目标关系、责任关系和利益关系。拓展流域经济模式，应在流域总体目标引领下，推进政策协调、规则衔接、生态补偿和利益调节，明确保护责任、治理成本和发展收益的分担关系，增强流域联动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健全流域尺度的政策协调和行动协同机制。以流域总体目标为统领，围绕生态保护、水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联通等重点领域，建立跨行政区常态化协商机制和联合行动机制，将流域总体目标落实到地方规划、专项政策、重大项目和年度任务之中，促进流域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相协调。把理顺行政区边界和流域边界关系作为完善流域治理的重要内容。

完善横向生态补偿和利益协调机制。健全流域内部横向生态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使保护修复流域生态环境的地区获得合理补偿，破坏流域生态环境的主体承担相应责任。重视上游地区、资源输出地区的发展利益诉求，引导下游地区、资源输入地区对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供给承担相应补偿责任，推动上游保护责任与下游受益关系制度化，并在流域尺度上统筹保护责任、补偿标准、收益共享和成本共担。

推进规则衔接和标准协调。围绕规划要求、环境标准、产业准入、项目审批和监管执法等方面，加强跨区域规则衔接和标准协调，减少制度摩擦，降低合作成本。通过健全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和责任分担机制，统筹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增强流域内部利益联结和协同发展基础。

（五）贯通规划、政策与评估，健全流域治理长效机制

以流域总体规划为统领，推动规划要求、政策落实、项目实施和监测评估相衔接，健全流域治理长效机制。流域总体规划应明确生态安全格局、开发强度边界、水资源利用上限、功能定位分工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并落实到地方规划、专项政策和项目安排之中。推动流域重大任务由分头推进转向协同推进，对跨区域重点任务，应在流域尺度上明确责任分工、实施顺序和资金安排，推动各地区围绕流域总体目标共同落实。

同时，强化流域尺度的动态监测评估。围绕水资源利用效率、水环境质量、生态保护成效、空间布局优化和区域联动效果等指标，开展覆盖相关区段的监测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用于后续政策调整、资金安排和项目优化。通过规划统领、政策落实、项目实施和监测评估相衔接，推动流域治理由分散推进转向闭环运行。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资源约束、空间组织、要素配置与制度协同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对以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理论逻辑、主要现实约束与实践进路进行了系统分析。资源环境承载边界通过限定开发强度和功能边界，构成区域联动的前置条件；节点城市、通道体系和区段分异共同塑造区域联动的空间格局；市场一体化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要素流动，提升区域联动发展效率；跨区域规则衔接与利益协调构成区域联动发展的制度保障。然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产业布局与承载能力错位、生态补偿制度不健全、政策取向分化以及规划—政策—实施—评估衔接不畅，反映出流域整体性尚未充分转化为有效的开发约束、空间组织、市场联通和协同治理安排。相应地，应从资源承载边界管控、主体功能区划引导、统一大市场建设、跨行政区制度协同和闭环治理完善等方面发力，夯实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条件与治理支撑。

围绕流域经济模式的研究仍有深化空间。不同类型流域在资源禀赋、空间结构、产业基础和治理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区域联动的形成条件、

治理重点和推进方式也有所不同。本文提出的理论逻辑框架仍需结合不同流域实践加以检验；不同类型流域比较、流域联动效应量化识别，以及相关制度工具实施效果跟踪评估，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

[1]宋建军.我国七大流域经济、人口发展比较及展望[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3，36(6)：14-20.

[2]陈才，刘曙光.区域经济地理学方法论建设初探[J].地理研究，1999(1)：2-7.

[3]宋敏，蔡婧瑜，任保平.新时代中国流域经济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展望[J].中国软科学，2023(3)：96-107.

[4]张思平.流域经济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5]刘世庆，巨栋.困境与破局:我国流域经济与政区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及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8，40(4)：66-73.

[6]易淼，赵磊，刘晗.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中国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略：基于马克思主义“分工—发展”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研究，2025(7)：5-15.

[7]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5.

[8]吴传清，叶云岭.破解“化工围江”难题的“湖北样本”和“江苏样本”[J].西部论坛，2020，30(6)：71-83.

[9]孔丹丹，刘峥.科技创新、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基于淮河流域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1，37(19)：133-137.

[10]史利江，刘敏，李艳萍，等.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J].地理研究，2020，39(10)：2361-2378.

[11]Chen Z，Kahn M E，Liu Y，et al. The consequences of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wa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18，88：468-485.

[12]赵敏，夏同水，马宗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2，31(9)：2096-2107.

[13]孙久文，崔雅琪，张皓.黄河流域城市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空格局与机制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22，37(7)：1673-1690.

[14]任保平，李培伟.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J].人民黄河，2023，45(9)：4-11.

[15]姚石，刘盼，位贺杰.粮食安全视域下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及驱动机制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8)：10-20.

[16]张改清，刘铄.黄河流域农业现代化水平时空演化及障碍因素解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3，44(4)：624-634.

[17]曾浩，余瑞祥，左桠菲，等.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5，35(5)：25-31.

[18]冯兴华，钟业喜，陈琳，等.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J].经济地理，2016，36(6)：18-25.

[19]张予川，戴承，张金鑫.长江经济带制造业服务转型路径选择：基于微笑曲线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7，31(6)：24-29.

[20]王林梅，邓玲.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证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经济问题，2015(5)：39-43.

[21]张跃，刘莉.绿色发展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地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J].世界地理研究，2021，30(5)：991-1004.

[22]田野，陈洁，董莹，等.长江经济带主导产业的类型与格局演化：以省级以上开发区为例[J].经济地理，2020，40(12)：100-108.

[23]王良虎，王钊.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20(5)：99-106.

[24]彭继增，邓梨红，曾荣平.长江中上游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7，37(1)：129-133+141.

[25]胡森林，曾刚，滕堂伟，等.长江经济带产业的集聚与演化：基于开发区的视角[J].地理研究，2020，39(3)：611-626.

[26]贾若祥，张燕，王继源，等.促进我国流域经济绿色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9(4)：48-52+59.

[27]易淼，张宁，赵磊.“四水四定”视域下中国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探析[J].经济纵横，2024(1)：110-118.

[28]邓创，曹子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联动效应及其转化机制研究[J].统计研究，2023，40(4)：34-45.

[29]张虹鸥，王洋，叶玉瑶，等.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与重点议题[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12)：1587-1596.

[30]陈耀.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若干思考[J].企业经济，2018，37(2)：11-19+2.

[31]毛熙彦，栾心晨，蒋一菲.长江经济带产业跨区域关联路径分析[J].现代城市研究，2021(5)：27-35.

[32]郝宪印，钱进.黄河流域协同科技创新实现路径研究[J].理论学刊，2024(2)：112-120.

[33]叶振宇.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成效与难题应对[J].江西社会科学，2024，44(7)：30-38.

[34]刘曙光，许玉洁，王嘉奕.江河流域经济系统开放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国际经典案例及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启示[J].资源科学，2020，42(3)：433-445.

[35]陆大道.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2002(1):1-6.
[36]韩增林,刘伟,王利."点—轴系统"理论在中小尺度区域交通经济带规划中的应用:以大连旅顺北路产业规划为例[J].经济地理,2005(5):662-666+676.
[37]覃成林.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与开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38]生延超,李金婧,徐珊,等.市场一体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资源科学,2024,46(3):462-474.
[39]李忠,刘峥延,金田林.健全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基于永定河流域的实践探索[J].宏观经济管理,2025(10):44-50.
[40]杨丹,常歌,赵建吉.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难题与推进路径[J].中州学刊,2020(7):28-33.
[41]高煜,许钊.超越流域经济: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与路径[J].经济问题,2020(10):1-9+52.

Promoting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the River-Basin Economic Model: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Li Pengfei Ye Yunling

Abstract: As a composite spatial unit with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attributes, the river basi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straints, spatial organization, factor allo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jointly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logic through which the expansion of the river-basin economic model promotes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straints delimit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functional boundaries; spatial organization shapes the "node-corridor" spatial configuration; factor allocation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ross-regional resource and factor allo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strengthens cross-regional rule alignment and interest coordination.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the river-basin economic model still faces several constraints, including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basin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capacity boundaries, the underdeveloped industrial division system guided by basin functional gradients, the absence of a stable interest adjustment mechanism between upstream protection and downstream benefits, the deviation between basin-wide overall objectiv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objectives, and the lack of closed-loop basin-wide governance. Accordingly, policy efforts should take resource carrying-capacity boundaries as the premise for advanc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use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ing as the spatial basis for optimizing basin spatial structure and overall layout;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connectivity and facilitating factor flows; use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to strengthen rule alignment and interest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e plann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basin governance.

Key Words: River-Basin Economic Model;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Spatial Organization; Factor Allocation;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责任编辑:柳 阳)